

头顶的 星空

美学与终极关怀

潘知常 著

头顶的 星空

美学与终极关怀

潘知常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头顶的星空: 美学与终极关怀 / 潘知常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495 - 7224 - 3

I. ①头… II. ①潘… III. ①美学—研究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738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阴牧云 顾杏娣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工业区 邮政编码: 102600)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37 字数: 560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目 录

开 讲 向头顶的星空致敬 / 1

第一讲 从终极关怀看中国艺术 / 34

一、从审美活动的价值取向到艺术活动的价值取向 / 34

二、“有形式的神性”与“有形式的人性” / 39

三、中国艺术的前世与今生 / 58

四、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 74

第二讲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 76

一、安史之乱:中国历史从盛到衰的转折点 / 77

二、杜甫应该得到千秋之下的中国人的褒奖 / 87

三、杜甫没有看到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根本缺憾 / 94

四、杜甫没有能够做到“眼界始大” / 107

第三讲 从《水浒传》到“水浒气” / 111

- 一、关于“伤害”的美学思考 / 111
- 二、个人恩仇与造反有理 / 115
- 三、中国的“家天下”社会的彻底崩盘 / 122
- 四、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借鉴 / 128
- 五、充满了爱心的博爱的大人格的诞生 / 134
- 六、再见,《水浒》! 再见,梁山! / 141

第四讲 从《三国演义》到“三国气” / 149

- 一、“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 149
- 二、从“权术崇拜”到“崇拜权术” / 154
- 三、西方文学的参照:英雄因何而伟大 / 164
- 四、从“抢椅子游戏”、“囚徒困境”到“人对人是狼” / 170
- 五、“三国气” / 175

第五讲 李后主为什么是李后主 / 185

- 一、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 187
- 二、李后主的“以血书”和“忧生” / 194
- 三、李后主比其他帝王多出了什么 / 200

第六讲 《金瓶梅》:裸体的中国 / 210

- 一、裸体的男女 / 213
- 二、裸体的民族 / 244
- 三、悲悯之书 / 268

第七讲 《哈姆雷特》：“我的爱永没有改变” / 291

- 一、从哈姆雷特到《哈姆雷特》 / 293
- 二、《哈姆雷特》背后的人性世界 / 310
- 三、《哈姆雷特》之后的“黄口小儿”与“流行的宠儿” / 317

第八讲 《悲惨世界》：以爱之名 / 328

- 一、苦难的根源：人性原罪与社会原罪 / 328
- 二、苦难的拯救：爱的法庭与仇恨法庭 / 335
- 三、苦难美学的启迪：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 / 339

第九讲 重读安徒生童话 / 347

- 一、重读《卖火柴的小女孩》 / 349
- 二、重读《海的女儿》 / 360
- 三、重读《丑小鸭》与《皇帝的新装》 / 369
- 四、他的名字叫童话 / 380

第十讲 《日瓦戈医生》：爱的审判 / 389

- 一、“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 / 389
- 二、“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 / 394
- 三、“失爱”的人性误区 / 400
- 四、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 410
- 五、一种获得世界的方式 / 418

第十一讲 王国维:生命绝唱 / 422

一、“忧生”美学的诞生 / 424

二、成也“痛苦”、败也“痛苦” / 429

三、王国维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 / 435

第十二讲 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 / 445

一、鲁迅是谁 / 445

二、“失败”的鲁迅 / 457

三、鲁迅的“失败” / 473

四、今天我们怎么样超越鲁迅 / 521

结束语 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在终极关怀的维度重建美学 / 530

后记 / 577

向头顶的星空致敬

进入 21 世纪,在我所出版的书籍中,以研究中国的古典名著的书籍居多。例如《〈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以及《说〈聊斋〉》,等等。

而在这些书籍中,关于四大名著的排名的重新思考,则是一个频频被提及的话题。

关于各种各样的排名,其实本不必当真——即便是四大名著的排名,也应当如此去看。但是,假设能够透过“排名”看到在“排名”背后的某种美学价值观念的预设,那么,就大可当真甚至应该较真了。

例如,从“四大奇书”到“四大名著”,《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进”、“出”意味着什么?再如,既然“四大奇书”可以被重新遴选剔除,那么,数百年后的今天,“四大名著”是否也应该被重新遴选剔除?

如果应该,那么,排名的结果应该是怎样的?

新的“四大名著”中的第一本小说肯定是《红楼梦》,这无疑没有问题的,也

可以在中国的学术界形成共识。

新的“四大名著”中的第二本小说,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金瓶梅》。

其中的道理,我在拙著《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已经做过说明。《红楼梦》和《金瓶梅》堪称中国长篇小说的双璧。《金瓶梅》的回归,实至名归。

令人困惑的是新“四大名著”中的第三本小说,尤其是第四本小说。

在新的“四大名著”中,可以排在第三名的,在反复思考之后,我最终认定的,是《西游记》。当然,这已经有点勉强。为什么会如此?其中的理由,不妨放在后面再说。

更让人更感兴趣的是排在第四名的文学作品,无论在新的“四大名著”中排在第四名的小说是哪一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排名资格却都显然已经颇值商榷。^①

在重新评价“四大名著”背后的,隐现于“重新评价”背后的某种预设的美学价值观念,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研究的对象。

过去评价“四大名著”,无疑是以中国自己的传统美学的价值观念作为美学参照的。可是,从20世纪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或者说,世界已经进入了中国。而中国进入世界和世界进入中国,其根本标志,就是现在再也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比,而是要拿中国的作品跟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去比。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先行调整自己的隐现于“四大名著”背后的关于某种美学价值观念的预设。

类似于中国的体育比赛,例如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中国是全国冠军,但却始终无法获得世界冠军。还有些项目,也只有全国比赛,但却不被世界所接受。在这一切背后的,不仅仅是由于我们过去所喜欢搪塞的所谓“水平不够”,更多的,还应该是更为内在也更为深刻的价值取向的差异。

① 潘知常:《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学林出版社,2007年;王学泰、李新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以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现象为例,在中国,赵本山的小品肯定是全国冠军,所谓“小品王”,就是证明。可是,非常奇怪的是,在西方世界,赵本山的小品却很少有人喝彩。原来,他的小品在国内演出的时候,依照我们的美学眼光,并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国外就不同了。残疾人是弱者,跟女性和动物一样,是要受额外保护的,可是赵本山的小品却是以模仿残疾人讥讽残疾人为基本特色的,于是,赵本山的演出在西方也就理所当然遇到了致命的阻击。

再比如张艺谋的电影。张艺谋的电影在中国不折不扣是全国冠军,但是张艺谋的电影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世界冠军?张艺谋最想拿的大奖当然是奥斯卡金球奖,可是却总是无法如愿。就好像中国男子足球队,在国内可以称王称霸,到了全世界,却就不行了。有人说,他每次都是离拿全世界的冠军——奥斯卡金球奖只差了一点点。可是,差了哪一点点呢?这很值得思考!

例如《金陵十三钗》,张艺谋花了很大的成本,高达六个亿,而且请了全世界二十六个国家的好莱坞一线明星,组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创作团队和制作团队,结果最后还是输了,而且输给了一部伊朗的投入仅仅五十万美元,演员也只有十人左右的影片《一次别离》。为什么会如此?简单说,张艺谋的影片里有一个观念在西方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对于妓女的歧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的核心主题是“以命换命”,当然,这样的电影主题在当今世界并不稀罕,著名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也是“以命换命”,是“ $8=1$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则是“ $13=12$ ”。然而,遗憾的是,他的换法却为西方世界所拒绝接受。在他们看来,《拯救大兵瑞恩》的“ $8=1$ ”非常值得,可是《金陵十三钗》的“ $13=12$ ”却非常不值得。

张艺谋的想法其实也很“中国”。这十三个人里十二个是妓女(还有一个小男生男扮女装),给她们一个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机会,让她们站出来做一回好人,去把那十二个纯洁小女生的生命换回来,对此,我们中国人无疑会予以“赞美”。可是,在西方人看来,妓女已经是受尽欺凌和压迫的人了,你怎么忍心让她们再被欺凌一次?而且,那些女中学生为什么不能自己出面去承受自己所理应对的那些苦难?再联想一下西方的著名小说《羊脂球》,应该可以清楚意识到,按照西方人的眼光,张艺谋的作品的评价为何会一下子就一落千丈。他的这部作品要拿奥斯卡金像奖,显然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还回到四大名著的重新评价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必须按照当今世界所共同认可的美学价值取向去重新评价。显然,《红楼梦》是完全可以经受住当今世界的美学价值取向的考验的。《红楼梦》跟全世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相比都毫不逊色。其次是《金瓶梅》,借助当今的美学价值取向,它的美学地位也开始上升。还有一部作品,现在也依旧可以放在“四大名著”之中,不过,按照当今世界的美学价值取向,它却毕竟有其不可忽视的缺陷。这就是《西游记》。

如果放在当今世界的美学价值取向平台上衡量,《西游记》的人性挖掘和美学眼光确实都有点不够级别。^①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有一个演讲专门谈到过,题目叫做《躲避自由》,而且也已经收入了我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此处不赘。在这里,我只想介绍一下胡适先生的看法。五四的时候,胡适先生提出:要改写《西游记》的结尾,否则,《西游记》就没有办法成为世界一流的小说。胡适先生后来果然如约完成了这一工作。在空闲的时候,他把西游记的结尾改写了一下,有几千字。《西游记》本来写唐僧带着几个徒弟到西天取经,在最后顺利地完成任务并且被论功行赏后,小说就结束了。孙悟空被封了“斗战胜佛”,猪八戒也被封了“净坛使者”,等等。但是胡适说,有一件事,《西游记》如果不交代,它的美学格调就提不上去。唐僧本是高僧,所谓高僧,就应该秉赋“以身饲虎”的品格。一路上有那么多人都要吃你,这说明他们需要,可是,你为什么却躲来躲去不给他们吃呢?这根本就不符合佛教的最根本的含义。何况,你不让吃也就算了,为什么还默许你的徒弟杀来杀去,把那些妖魔鬼怪杀死了不少呢?胡适先生说,这个问题《西游记》必须要回答,否则,就会大大影响《西游记》这部小说的美学格调。所以,胡适先生就给它加了个结尾:唐僧的取经任务完成以后,就立即宣布召开大会,并且把所有被杀被打的妖魔鬼怪们都请了过来。然后,唐僧上去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他说:我过去为了完成神圣的取经工作,因此才没有让你们吃我,因为那时候我的身体很重要。现在我神圣的取经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今天,我就坐在这里,你们都可以上来,都可以随便吃我,而且,愿意怎么吃就怎么吃。

① 同类题材中,给我们以更加深刻的启迪的,是西方的《天路历程》。

无疑,有了这个结尾,《西游记》的美学品格确实是大大地提升了,也确实是更有条件可以进入世界冠军级别的文学长廊了。然而,这样的修改,无疑又是在具备了当今世界的美学价值取向以后,才会有所意识的,也才会有所彻悟的。

二

推而广之,由上述思路,进入 21 世纪的十几年中,在我的研究中,又进而关注了中国美学的两大美学传统,当然,关于两大美学传统的区分,也仍旧同样是我对于隐现在它们背后的某种美学价值取向的预设关注结果。

而今回头来看,我的工作可以区别为两个专题。

一个专题是对于从《诗经》到《水浒传》的美学传统的批评。它意味着一个“忧世”的美学传统,一个按照王国维的话说是“以文学为生活”^①的美学传统。当然,无法否认的是,这个美学传统实际也是中国美学的主流。这也正是 20 世纪初年王国维、鲁迅在批评中国美学的缺憾时使用了全称判断的理由与原因。不过,“主流”却并不等于“精华”。在这方面,常见的错误有两个,一个是把中国美学的“主流”等同于中国美学的“精华”,目前的中国美学的研究者们的看法大多就是如此;一个是把中国美学的“主流”等同于中国美学的全部,因此,也就把对于中国美学的主流的批评看成对于中国美学的“精华”与“全部”的否定。于是,也就自然无法深刻理解当年王国维、鲁迅的对于中国美学的批评,也无法理解我们作为王国维、鲁迅的美学后人的对于中国美学的批评。

在这个方面,我认为 20 世纪的五四新文化对于儒教的批评是找错了目标。不但没有意识到“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而且没有意识到“明清之后,已无华夏”。事实上,在“崖山”之后,影响并流毒中国的,是宋明理学,是明儒与清儒,而不是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同时,在后期中国,在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基础上形成

^①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第 29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年。

的中国美学精神的主流地位也已经让位于在宋明理学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美学精神——“小说教”(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影响。后者对我们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影响,其深刻程度和巨大程度,我们到现在却还是缺乏清醒与深刻的估计。我认为,这已经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缺失。因此,还有必要“接着”我们的五四前辈去“说”。后来我把这部分讲稿加以整理,题名《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予以出版。

还有一个专题,是对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美学传统的弘扬,这是一个“优生”的美学传统,一个按照王国维的话说是“为文学而生活”^①的美学传统。“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里说:“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②《红楼梦》的美学传统,正是中国美学的“精华”。它是“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它是溯源于《山海经》的庄子的生命美学、魏晋的个性美学与晚明的启蒙美学的集大成,也是中国的原始儒家与原始道家与佛教文化的三次对话而产生的宗教、哲学与美学三大成果的美学结晶(其次还有在宗教方面所产生的禅宗、在哲学方面所产生的心学),同时,这个美学传统也孕育了王国维、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海子、史铁生等一大批《红楼梦》的美学传人。

以庄子的生命美学、魏晋的个性美学与晚明的启蒙美学为例:

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美学传统的真正源头应该是《山海经》。《山海经》里的人物,乃是最为本真的中国人。“生日月”的羲和、“化万物”的女媧是中国的开辟女神;舞干戚的刑天、触不周的共工是中国的血性男儿;衔木填海的精卫,布土治水的鲧禹父子是反抗命运的悲剧英雄。《山海经》写了生命的热爱和愤恨,欢欣和恐惧,反抗和膺服,它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血性之源。遗憾的是,《山海经》

①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第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②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这一美学源头后来被中国美学的“主流”遮蔽甚至扭曲了。就以伯夷、叔齐为例，他们隐居在首阳山，不食周朝之食，就正是对于从《山海经》发源的美学传统的呵护。《采薇》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其中就蕴含着对于“以暴易暴”的抨击，对于《山海经》这一美学源头的“命之衰矣”的感叹，以及“我安适归矣”的忧伤，至今还让我们心痛不已。

庄子的生命美学、魏晋的个性美学与晚明的启蒙美学则恰恰是《山海经》美学源头的继承者。

在儒、释、道之中，庄子的美学隐含着一种内在的二重性。这就是：在强调人之自然时，他无疑是尊重生命的，当然主要是精神的生命，庄子美学也因此而被称之为生命美学。这就是：庄子所强调的“道”的超越性、所强调的“以游无穷”（追求无限）、所强调的由于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而出现的“无为”、所强调的“不为物役”、所强调的“性”（“马之真性”），但在强调天之自然时，人之自然就没有了，尽管仍旧是尊重生命的，但却只是肉体生命（所谓“保身”），在此意义上，庄子美学则很难被称之为生命美学，而只是逍遥美学。这就是庄子对“道”的遍在性的强调、对“乘物以游心”的强调（满足有限）、对由于对于肉体自由的追求而出现的“无为”的强调、对“残生伤性”、“弃生以殉物”的强调、对“形”的强调、对“顺物自然而与世俗处”的强调。因此，当庄子说人应重返自然的时候，这个“自然”无疑是天之自然，它是“恬淡、寂寞、虚无、无为”的，因此，人也应是“恬淡、寂寞、虑无、无为”的，由此，就有了“形若槁木，心如死灰”，“吾丧我”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系列言论）。但是，作为天之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独特禀性，诸如人的未完成性、无限可能性、自我超越性以及未定型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不也是一种自然——人之自然吗？人类要重返自然，不是应该重返这个人之自然吗？或者说人类不正是因为做到了“顺乎己”才最终做到了“顺乎天”吗？而且，我必须强调，其实庄子已经不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区别，甚至提出了“任其性情之真”这样一个值得大加发挥的命题，它把“事亲为大”还原为“性情为大”，把“仁义礼智信”还原为“生命在世”，无疑，“任其性情之真”这个命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应该是中国的《红楼梦》美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魏晋的个体美学是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魏晋,鲁迅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确实是十分精到。而魏晋个体美学的精彩,也只有晚明的主体美学可以媲美。它在中国美学史里第一次喊出了:“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殷侯)而且,儒、道所提倡的“圣人忘情”,高则高矣,但与真实的人生无关;放弃对于生存意义的追寻的“最下不及情”,也与真实的人生无关;真实的人生,肯定应该是钟情的人生,因此,“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在这里,所谓的“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美学研究中所强调的生存论意义上的情感判断,是完全超出“忠孝为本”之外的,魏晋的个体美学把它叫做“畅适之一念”(宗炳),而“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萧子显)。其中,阮籍、嵇康就是魏晋的个体美学的代表,他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的风范,至今令我们追慕和敬仰。

晚明的启蒙美学在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里更是不能不提。从明中叶开始,中国美学的无视向生命索取意义的人与意义维度以及为此而采取的“骗”、“瞒”、“躲”等对策,逐渐为人们所觉察,为此,李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李贽疾呼要“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狱有佛,即赴地狱”,甚至反复强调“凡为学者皆为穷究生死根由,探讨自家性命下落”。对这一“性命下落”,李贽干脆把它落实到“人必有私”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之中。于是,他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转而提倡庄子的“任其性情之情”,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各遂其生、各获其愿,认为“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从而把儒家美学抛在身后;同时认为“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因此没有必要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来统一“性命之情”,从而把道家美学也抛在身后。应该说,这正是对于生命的根本价值、终极价值的高扬。在他的身后,是“弟自不敢齿于世,而世肯与之齿乎”并呼唤“必须有大担当者出来整顿一番”的袁宏道,是“人生坠地,便为情使”(《选古今南北剧序》)的徐渭,是“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记题词》)的汤显祖,是“性无可求,总求之于情耳”(《读外余言》卷一)的袁枚,等等。而美学主张更有“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情”、在“道理闻见”之外的“童心”与“病梅”不同的“面目也完”,我过去在《美的冲突》里也曾经对其中的从“意境”到“趣味”、从“以幻为奇”到“不奇之奇”、

从“乐而玩之”到“惊而快之”、从“类型”到“性格”做过详尽的讨论。从此，“我生天地始生，我死天地亦死。我未生以前，不见有天地，虽谓之至此始生可也。我既死之后，亦不见有天地，虽谓之至此亦死可也”。（廖燕：《三才说》）伦理道德、天之自然开始走向人之自然，伦理人格、自然人格、宗教人格也开始走向个体人格，总之，生命的现实价值、功利价值开始走向根本价值、终极价值，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由此得以羽翼丰满。

王国维、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海子、史铁生等人也如此。例如张爱玲，这个绝版的天才作家，其实就是“女中鲁迅”。17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却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犹如在灵魂中却蛰伏着的啃噬着人性的“虱子”，人类失爱的困境，被她呈现而出。更让人敬佩的是，张爱玲并没有写过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在她的笔下，人人都自行其是、自说自话，可是最终的结果偏偏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命运的“无缘无故”的陷阱。没有一个人在命运面前不是“闯了祸的小孩”，不是被命运推搡着而茫然不知所措地前行。再如沈从文，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作家，在他的作品里，你可以发现，生命的尊严、生命的爱在他的眼里都是无限“庄严”的，而他写小说则是去反映这个“生命”的无限庄严和无限的美，是去展现生命的神性，是去看护生命的尊严。看到生命中爱与美的获得，他去表现——去赞美；看到在命运的沉重碾压下美和爱的沦落飘零，他也去表现——去悲悯，在他的作品中，充盈着爱的力量和爱的觉醒。

当然，其中的最高峰，是《红楼梦》。只有《红楼梦》，才是中国美学的第一次的大梦初醒。《红楼梦》的诞生，其实也就是“忧生”、“为文学而生活”以及终极关怀的美学传统的正式诞生。“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爱起来”，则是我们在古老中国所能够聆听到美学最强音。^①

无疑，把握中国美学，这是一个最好的角度，继承中国美学，这是一个最好的

① 关于《红楼梦》，我已经写过三部专著去专门讨论，限于篇幅，本书不再论及。请参看拙著《〈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潘知常导读〈红楼梦〉》（学林出版社，2008年）以及《说〈红楼〉人物》（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

传统,发扬中国美学,这也是一个最好的起点。不过,由于它并非中国美学的主流,因此也往往被中国美学的“主流”遮蔽,或者被中国美学的“主流”扭曲,这就是鲁迅说的:“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在未能意识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贻害中国的同时,20 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能够挖掘到明末清初以三袁为代表的美学思潮并作为自己的思想源头,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可是,也还同样不够深入,因为五四新文化的真正的精神源头,在中国,应该是:《红楼梦》。

必须强调的是,所谓中国的两大美学传统,不论是“忧世”抑或“忧生”,也不论是“以文学为生活”抑或“为文学而生活”,其实都不是文学与非文学、美与非美的区别。《水浒传》与《荡寇志》的区别、《红楼梦》与《红楼梦》续书的区别、鲁迅与清末谴责小说的区别、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的区别,无疑就都不在此列。所谓中国的两大美学传统,指是好的文学与不好的文学、终极之美与一般的美的区别。换言之,所谓中国的两大美学传统,意在呈现隐含在中国美学内部的某种深度的美学悖论。“忧世”抑或“忧生”、“以文学为生活”抑或“为文学而生活”,恰恰蕴含着两个不同的美学向度。这就犹如我们不难在中国历代的思想家的思考中看到关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考,以及“不独亲其亲”的“仁者爱人”(儒家)、“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家)、“慈悲”(禅宗)的思考,同时更不难在中国历代的思想家的思考中看到“天下为家”的小康思考,以及“各亲其亲”的“忠孝为先”的思考,所谓“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①、“人也只有一个父母,哪有七手八脚爱得许多”(《朱子语类》卷五十五)。

这个深度的美学悖论,在 20 世纪初的王国维、鲁迅的有关论述中,其实也已经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文学艺术,王国维就曾经批评说:“无独立之价值”,“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葱然以听命于众”,造成了事实上的“我国哲学

^① 《孟子·尽心上》。